

中共直南地方党组织创建的考察

陈静^{1,2}, 孟令择^{1,2}, 张金鑫^{1,2}

(1. 河北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38;

2. 一二九师、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暨抗日战争史研究基地, 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中共直南地方党组织的创建是直南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此种必然结果的直接原因为该区域社会的政治混乱性、经济凋敝性及文化超前性等因素的影响及作用,根本原因为帝国主义与直南各社会阶级、封建主义与直南人民群众这两对近代直南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共直南地方党组织创建的独特路径表现为该区域具有革命思想策源地——大名第七师范学校及革命斗争策源地——磁县,以及七师党员师生和磁县党组织务实稳重的创造性的革命工作。根据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对立统一的原理,帝国主义与直南各社会阶级、封建主义与直南人民群众这两对近代直南社会的主要矛盾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直南党组织产生的必然性表现出了上述矛盾的普遍性,直南党组织产生的特殊方式表现出了上述矛盾的特殊性。

[关键词]直南;党组织;创建;必然性;特殊性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4.01.006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24)01-0044-05

20世纪上半期的直南地区与现今行政区域不同,其范围指原直隶省南部地区,核心区域主要包括磁县、大名、南乐、清丰、濮阳、东明、长垣等县,是冀鲁豫三省交界所在。

20世纪的革命年代,直南起着连接太行与山东、华北与华中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相较而言,该区域党组织创建的相关历史研究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目前除《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战史》《冀鲁豫边区革命史》等通史类著作的部分内容有所涉及外,鲜见此方面的专题研究。针对上述状况,本文拟对中共直南地方党组织(以下简称直南党组织)的创建活动进行探讨,以加深人们对该方面历史的了解和认识。

一、直南党组织的创建是该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20世纪20年代初,直南党组织的创建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该区域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此种历史必然性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一) 政治的混乱性

辛亥革命后,地处河北、河南及山东三省交界地带的直南地区政治上处于混乱状态,各派系军阀为

争夺该区域的统治权而展开长期的拉锯战。受不同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各派系军阀不具备碾压其他各方势力的绝对实力,因此在直南地方,多数时间内表现为各派系军阀之间的混战,“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不是某一派系军阀长久占据与统治该区域。

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为军阀势力主要集中于城市,其势力不能绝对控制广大的乡村地区,在直南这样数省交界的乡村地带,军阀势力更显虚弱。因此,某种程度上说,直南的农村地区,政府政治权力(军阀及隶属于军阀的地方政府)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真空状态。由此,直南便滋生了一种畸形政治力量——土匪。在军阀混战的环境下,直南各地土匪虽然随着该地军阀势力消长、来去而呈现兴灭不定的状态,但却或大或小地散布于直南地区。

(二) 经济生活的破坏与凋敝

军阀混战需巨额军费作支撑,为此各派军阀均对人民群众滥收捐税,“任意掠夺抢劫人民财产”^[1]。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一次从直南邯郸县征收军费18万元,1926年奉系军阀为应对战争开销,预征直隶省全省地丁税16年。乘此机会,把持基层农村政权的地主劣绅在替军阀征收捐税时层层加码,长收短出,大肆贪污肥己,采用捆绑关押等暴力

[投稿日期]2023-09-27

[基金项目]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22BDJ048)

[作者简介]陈静(1974-),男,河北成安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根据地史、党史、抗日战争史及中国近现代史。

方式强行收捐收税,部分农民为交纳苛捐杂税不得不卖房卖地。雪上加霜的是,大小土匪绑票勒索、杀戮、抢掠某村某地等事情在直南地区频频上演。如此,本属于人民群众用作再生产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或是充作军费,或是变成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的个人资产,或是被土匪据有,社会再生产能力严重下降,经济生活受到严重侵害。

附属军阀的地方政府无暇、无力亦无心修建农田水利等设施。流经直南的漳河等河流年久失修,雨季泛滥,淹没沿途大量房屋良田,导致大量灾民流离失所,加之一些旱、雹等灾,社会底层大量人口或饿死或逃荒,生产人口日益下降萎缩。

直南连年不断的天灾人祸直接后果是该区域经济活动日益破坏、凋敝。

(三)文化的超前性

20世纪初,欧风美雨纷至沓来,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传入国内并逐渐取代旧的封建文化。随着废科举兴学堂及出国留学的兴起,中国国内学习西方文化的热情逐渐高涨。受此国内大环境的影响,直南地区亦开始出现新式知识分子并逐步取代旧封建文人。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加速了科学与民主等新思想在直南地区的传播,受五四运动巨大影响,代表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马列主义也得以在该区域传播开来。该区域“不少人在旧民主革命失败后,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还有不少人支持共产主义事业,成为坚定的民主左派”^[2]。

直南政治混乱和经济生产破坏的直接后果就是该区域社会的崩盘。崩盘的社会有两种可能的结果。其一是完全毁灭,即在世界上消失,就像一些远古文明湮灭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一样;其二是涅槃重生。直南区域社会步入文明门槛已历经了数千年的时间,具有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这种自我调节能力杜绝了第一种可能结果的发生。杜绝了第一种结果,就意味着必然是第二种结果,即具有较高自身调节能力的直南区域社会为避免自身的覆亡,必然会发生如下历史过程:该区域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士创建旧社会内部没有的、崭新的、彻底革命的政党,该政党领导人民群众走出困境,实现涅槃重生。因此,直南党组织的创建是该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直南党组织创建的独特路径

近代中国社会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这种不平衡源于“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

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3]49}。受上述因素影响,地处河北、河南及山东数省交界地带的直南地区党组织的创建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独特性。

(一)革命思想的策源地——大名七师

1923年创办的直隶省第七师范学校(大名七师)之所以能够充当革命思想的策源地,源于以下几个前提条件。其一,直隶省第七师范学校属于省属院校,是当时直南豫北最高学府,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其二,学校创建者兼首任校长谢台臣具有较深的国学造诣(晚清秀才),又富于新式西学知识(毕业于保定直隶省高等师范学校),学识渊博、性格坚强、精明强干、办事有毅力,在保定、天津、北平等地任教多年,兼具直隶省议员的身份,在当时的直隶省具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和一定社会人脉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谢台臣具有科学与民主、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其创建七师的初衷之一便是培养进步知识分子。其三,谢台臣聘请的教师团队基本上为具有较高新式知识水平且具有科学与民主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其四,学校奉行民主和科学的教育理念。七师实行民主的口号为“师生打成一片”,就是尊重学生,提倡师生平等,学生可以向老师提意见。学校提倡科学的口号是“以作为学”,谢台臣校长将“以作为学”解释为“凡是称得起科学理论的,都是实践的结晶,只有从作中锻炼出来的理论才能指导行动,才算真理论。理论与事业分家,教育与实践隔离的理论家与学者都是废人的别名”^{[4]67}。与以往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不同,七师特别反对读死书,与此相反,大力提倡理论与实践结合。依据上述教育理念,学校制定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教学大纲,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为科学的头脑、劳动的身手、艺术的情趣、改造的魄力。其五,学校进行了教材内容的改革。学校废弃了北洋军阀政府指定的带有落后封建思想的旧教材,编写了体现民主科学思想的新教材。教材的内容以当时国内外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如中国作家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郑振铎,外国作家高尔基、托尔斯泰等,历史教材选编了体现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中国历史讲义》。另外,学校还订购了大量进步图书、刊物,供学生在课外时间学习阅读,以此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

1926年8月,中共豫陕区委委员冯品毅应谢台臣校长之邀担任七师教师。冯品毅为大名人,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参加过五四运动,是中国早期的共产党党员。冯品毅任教期间,在师生中间组织

读书会,“向学生介绍《唯物史观略解》《辩证唯物主义》等社会科学书籍”^[5],在其影响及努力下,一些进步师生开始逐渐接受、信仰马克思主义。同年十月,冯品毅离开七师,其离校前,发展了刘大风、赵纪彬、李世玮入党。随后,刘大风、赵纪彬介绍成润、吴益普入党并建立党、团两个特别支部,刘大风担任党的特支书记,成润担任团的特支书记。随着七师党员人数的增多,1927年中共大名县特别支部改建为中共大名县执行委员会(中共五大后改称中共大名县委员会)。冯品毅在七师虽然任教时间较短(约3个月),但其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播种工作,其在七师播撒下革命的种子。此后,七师有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了党团组织。

初生的中共大名县特别支部及其后中共大名县执委会、中共大名县委员会(因上述党组织主要依托七师进行活动,以下上述党组织简称为七师党组织),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宣传党的思想理论:其一,订购《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并自办《曙光》等刊物,组织学校师生阅读;其二,放假期间,数百名师生分赴直南豫北的各自家乡进行革命活动,采用讲演、谈话、演戏等方式宣扬传播马列主义。七师师生的这种宣扬教育活动使革命思想传遍了广大的冀南平原。

以上思想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效果,不仅“全校近1000名师生员工在这所革命摇篮里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革命思想的熏陶,先后有200多人在校参加党团组织,还有不少人参加‘反帝大同盟’‘读书会’等党的外围组织,成为一支相当大的革命力量”^[6]。大名七师的党员学生和进步学生,或是放假期间在家乡宣传革命思想,或是毕业以后在直南各自工作岗位上继续宣传革命思想。由此,七师成为红色革命思想的策源地。

(二) 革命斗争的策源地——磁县

位于河北、河南两省交界处的磁县工人阶级具有四个显著特点。“其一,队伍庞大,有4万人。其二,相对集中,主要在煤矿、陶瓷两大行业。其三,同农民保持着天然联系。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容易同农民结成牢固的联盟(事实上该县工人与农民常常联合起来对该地的资本家、封建地主进行斗争)。其四,信息灵通。地处京汉铁路沿线,临近的郑州、保定、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一旦发生重大事件,很快会在磁县引起反应。这是历次政治风暴、革命斗争中,磁县工人运动爆发迅速猛烈的一个重要原因。”^{[7]5-6}上述特点加上帝国主义及封

建主义对该地的残酷统治,使磁县工农大众富有革命斗争精神。1922年12月磁县第一个中共党小组诞生,1925年7月中共磁县特别支部成立(简称磁县特支),1926年4月中共磁县执行委员会成立(简称磁县执委会),1927年4月中共磁县执委会改称中共磁县委员会(简称磁县县委),1930年6月中共直南特别委员会在磁县成立(简称直南特委)。上述这些党组织是中共在直南区域的第一个党小组、第一个党支部、第一个县委及第一个特委。

1926年,磁县执委会领导农民群众发起了反贪污反清算斗争。军阀统治期间,土豪劣绅是封建军阀的阶级基础,封建军阀是土豪劣绅的政治靠山,两者互相勾结,盘剥广大人民群众,磁县“在行政管理上,全县设42个约,每约设一约长掌管十几个村”^{[7]8}。约长、村长为大小土豪劣绅或其代言人所把持,“他们乘军阀官吏要粮要款之机,长派短出,从中作弊,贪污肥己”^{[7]8},给磁县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广大农民群众对此种情况是深恨而又奈何不得。磁县县委成立后,派党员深入群众,这些党员通过座谈、访谈等形式具体了解到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生活状况,其后成立“清账委员会”,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向约长、村长展开斗争。在反贪污斗争中,广大农民群众多年的怨恨得以释放,农民踊跃参加,斗志旺盛,成绩显著,迫使岳城等村的约长、村长向农民返还其贪污款近7000元。清出的贪污款全部分给农民。该胜利鼓舞了农民的斗志,扩大了党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磁县彭城瓷窑资本家经常以“双扣底”和“药货钱”等名目克扣小车工人(用手工小车推运瓷货的工人),使广大工人群众生计艰难。1932年4月,瓷窑资本家又实施了“不按市价折合”发工人工资的政策。磁县党组织派王维纲深入工人群众之中,领导工人群众对资本家的斗争。王维纲接受任务后,深入工人群众之中,同穷苦工人群众打成一片,访贫问苦,进行阶级教育,发展党员,深得工人群众的尊重和爱戴。几天后,王维纲领导小车工人成立了小车工会,制定了《罢工宣言》,明确地提出了行动纲领和斗争目标。小车工会成立后,工人群众积极参加,半月时间内,不仅把一千余名小车工人全部组织起来了,而且从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

1932年6月5日,磁县县委组织全体小车社工人召开罢工誓师大会。罢工开始后,瓷窑资本家勾结当地驻军对罢工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在王维纲等人的坚强领导下,资本家各种阴谋和破坏被粉碎,工人斗争情绪日益高涨,瓷窑资本家感到十分恐慌,经

过数月坚持,瓷窑资本家被迫答复了工人提出的全部要求,取消了剥削工人的一些苛刻规定,赔偿了工人罢工期间的损失,罢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除上述斗争外,磁县党组织还发动领导了反“插楼应差”、六河沟煤矿工人万人大罢工等系列斗争。在这些革命斗争过程中,磁县逐渐成为直南革命斗争的策源地,影响带动了直南的清丰、南乐、濮阳等地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

(三)务实的工作方针

大名七师党组织的工作方针为“发展组织,积蓄力量,为党培养干部,尽量不暴露党员和党组织”^{[4]142}。此方针的制定源于校长谢台臣、教务主任晁哲甫等人对斗争形势的理性分析和判断。谢台臣等党员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兼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他们分析七师内部情况为进步师生集中,党组织完全掌握该校领导权,外部环境为处于反动势力统治地区,敌我力量悬殊较大,综合这些内外因素,制定了上述务实、稳定的工作方针。

在上述工作方针指引下,七师党组织利用我党掌握学校领导权的有利条件,聘请大量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共产党员担任学校教师。党员教师在课堂教学及课外活动中向学生宣扬马列主义,学生党员利用同学间的亲密关系,向周边的同学宣扬马列主义,通过教师对学生、学生对学生、教师对教师及学生对教师等工作方式发展党员,结果七师全校三分之二师生成为党团组织或党的外围组织的成员。这些师生党员放假期间,在各自乡村宣扬马列主义,在各自乡村发展党员,创建基层党组织。

磁县党组织在进行革命斗争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地发展壮大工作方针。开展工作之初,从教育周边群众思想入手,在此过程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从积极分子中吸收发展党员。此后,随着党员人数的增长,循序渐进地创建党小组、党支部,直至创建磁县县委。县委成立后,针对农民反捐税的强烈愿望,领导农民开展反苛捐杂税等农民运动并取得胜利。农民运动的胜利壮大了党的组织,壮大的党组织又领导农民取得更大的农运胜利,在此良性循环中,磁县逐渐成为具有良好群众基础的地区。

七师党组织及磁县党组织的领导者多为“本土派”的地方精英,这些精英人物主要有如下特点:其一,多数党员为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其二,熟悉斗争环境,长期甚至自幼时“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家乡)的环境中”,对直南的社会环

境认识深刻,甚至熟悉到了一草一木的地步;其三,受血缘、乡缘等天然因素的影响,与当地人民群众具有紧密的联系。

身具上述特性的晁哲甫及王维纲等人“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斗争”。^{[3]287}在建党实践和开展革命活动中,他们把革命理论和家乡的实际环境相结合,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斗争形式,即磁县党组织因时制宜把磁县发展成为具有良好群众基础的地区,七师利用自身宣传教育优势,把革命火种撒遍直南大地,这是党在直南创建的独特路径。

三、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矛盾是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动力、原因及根据,不仅确定事物的本质,而且决定事物运动发展的方向、趋势和结果。以上观点可以简要概括为“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3]319}。

从上述原理可以推断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中国人民大众这两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规定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也规定了近代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此种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领导近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艰巨任务,“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还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8]因此,“中国共产党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适应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近代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9]由此,可以看出,全国范围的中国共产党的必然产生根源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根本矛盾,该矛盾是全国范围的中国共产党的必然产生的根本原因。

同样,根据矛盾是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动力、原因及根据,不仅确定事物的本质,而且决定事物运动发展的方向、趋势和结果的原理,也可推断出帝国主义与直南各社会阶级、封建主义与直南人民群众这两对近代直南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直南党组织必然产生的根本原因。

“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3]318},“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是一种共性和个性、绝对性和相对性、一般性和个别性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矛盾的普遍性离不开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也离不开普遍性,离开普遍性的特殊性就会丧失它原有的共同性质,而具有另一类事物的共性”^[10]。

依据上述原理,帝国主义与直南各社会阶级、封建主义与直南人民群众这两对近代直南社会的主要矛盾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其普遍性的表现为此种矛盾决定了直南共产党必然产生,是直南共产党产生的根本原因;其特殊性决定了直南党组织产生的特殊方式——以大名七师为革命思想策源地、以磁县为革命斗争策源地的特殊方式产生党的地方组织。

综上所述,直南党组织产生的共性(必然产生)与个性(区域性的特殊方式产生)通过近代直南社会主要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结得以融会贯通,达到统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近代革命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的、根本的、决定性的逻辑和

规律。

参考文献

-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磁州文史资料(第一辑)[Z].磁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13.
- [2]中共邯郸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邯郸历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16-17.
-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中共大名县委党史办公室.中共大名县委党史资料选编(第一辑)[Z].大名:中共大名县委党史办公室,1989.
- [5]中共大名县委党史办公室.中共大名县委党史大事记[Z].大名:中共大名县委党史办公室,1989:4.
- [6]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工作组.冀鲁豫边区革命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24.
- [7]中共磁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磁县历史简读本(第一卷)[Z].磁县:中共磁县县委党史研究室,2011.
- [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2.
-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69-70.
- [10]陶德麟,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88.

[责任编辑 李瑞萍]

Investig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Zhinan Party Organization

CHEN Jing^{1,2}, MENG Lingze^{1,2}, ZHANG Jinxin^{1,2}

(1.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Hebei 056038, China;

2. 129th Division and Shanxi-Hebei-Shandong-Henan Revolutionary Base, Anti-Japanese War History Research Base, Handan, Hebei 056038, China)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Party organization in Zhinan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this region. The direct reason is the influence of its political chaos, economic decline, cultural advancement, etc. The fundamental reason lies in two pairs of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Zhinan's modern history; one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mperialism and various social classes, the other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eudalism and the people in Zhinan. Also, the uniquenes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Zhinan's Party organiza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aking Daming Seventh Normal School as its revolutionary ideological source, Cixian county as its revolutionary struggle source, and the pragmatic and creative revolutionary work of Party members in Daming Seventh Normal School and the Party organization in Cixian county. Additionally,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unity of opposites between the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contradictions, the two pairs of principal contradictions in Zhinan's modern history have both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Zhinan Party organization reflects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above contradictions, and the special way in which the Zhinan Party organization emerges reflects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above contradictions.

Key Words: Zhinan; Party organizations; establishment; inevitability; particularity